

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 理论和实践

高天如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

高天如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沪)新登字 202 号

责任编辑 杜荣根

书籍装帧 郑 群

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

高天如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竟成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375 字数 214,000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700

ISBN7-309-01120-1/H·114

定价: 6.0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概述了中国现代史期(上溯到清末维新时期)有关改革和建设汉语文的理论主张、学术争鸣、团体机构、提案决议、推行实际和研究成果,是一部综合研究文体革新、语言规范、文字改革诸语言计划事项的史论性著作。这在该学科的同类著作中尚属首次。本书具有新的理论视野和微观的剖析,并披露了许多仅见的文献资料,对了解我国现代语言计划事业的历史源流,对研究当代汉语言文字的现代化问题,均有参考价值。

目 录

引 言	1
一、晚清时期的语文改革及其历史地位	6
1. 提倡以口语为基础的“新文体”	7
2. 推广作为共同语的“官话”	11
3. 试行拼音制的“切音字”	18
[附录] 清末切音字方案一览表	25
4. 《一目了然初阶》及“官话切音字母”	30
5. 《官话合声字母》及“合声简字”	37
二、白话文运动和汉语书面用语的变革	46
1. 从革新文学的语言工具到白话文的推行	47
2. 关于维护文言文与推行白话文的论争	51

3. “白话”文体的探索和研讨	60
三、汉文书写款式和标点符号的更新	68
1. 变更汉文书写款式的主旨和施行实际	69
2. 新式标点符号的研制和应用	72
四、国语运动和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音系研究	81
1. 推进国语运动的机构、团体及其学术业绩	85
2. “注音字母”及其产生、修订的经过	94
3. “国语”的语音标准	100
4. 关于现代汉语语音标准论的历史发展	109
五、文艺语言的大众化和“大众语”问题	116
1. 文艺语言的大众化及关于“普通话”的争议	117
2. “大众语”问题的发生背景和论争对象	126
3. 关于“大众语”的理论主张及其对于建设现代 汉语书面语的意义	132
六、“国语罗马字”的研制及其实际应用	142
1. 研制“国语罗马字”的目的和历程	143
2. “国语罗马字”方案的技术特点	149
3. 关于“国语罗马字”的应用、传布、争议和 再修订	153
[附录] 台湾正式公布使用的《国语注音符号 第二式》	158
4. “区际罗马字与文言罗马字”和“类符新字”	162
七、“拉丁化新文字”的研制及其历史作用	168
1. “拉丁化新文字”的产生及其指导思想	169
2. “拉丁化新文字”的主体方案和方音方案系列	174

[附录] 六方案对照表·····	182
3. “拉丁化新文字”的推行实践、社会效应和 历史作用·····	188
八、现代史期的汉字简化工作·····	198
1. “五四”时期的简体字说及其理论建树·····	201
2. 《手头字第一期字汇》和《第一批简体字表》·····	209
3. 关于汉字简化的学术研究·····	217
4. 《宋元以来俗字谱》和《语体文应用字汇》·····	225
后 记·····	234
综合索引·····	237

引 言

“语言计划”(Language Planning), 作为一门学科名称被应用, 在我国还是近几年的事。它所研究的课题, 既有语言方面的, 也有文字方面的, 只不过并非如同纯语言学那样, 专以语言文字的本体构造、历史源流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而重在语言文字的实用价值。它是以确立民族的标准语言文字、规定国家语言文字应用的正式地位为己任的。其研究内容一般包括: 用什么语言作为民族的标准语或全国的共同语问题, 书面语言的变革及新文体的建设问题, 发展或变易传统的语言文字以及关于新文字的创制问题等, 目的都是为推进语文工具的建设及社会应用的共同化; 以适应社会进步、国家统一的需要, 实现语言文字的科学管理和民族尊严。

我国现代史期的汉语文改革和建设,所谋求的目标也就是:“语言的共同化,文体的口语化,标音的字母化,汉字的简便化”(周有光语)。其研究内容,也就是“语言计划”这一学科所需求解决的语文现代化诸问题。因此,当时虽无“语言计划”之名,却存在“语言计划”之实。至于习用的“文字改革”,尽管已包容语言问题,也难以涵盖语文改革和建设的全局,况且我国现代的语言计划事业是改革与建设并举、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因而本书题名为《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

本书虽说是以中国现代史期的语言计划为著述内容的,可也包容了前此清末维新时期的语文改革。这是由于维新时期的语文改革事业,已从近代史期的传统语言学中脱颖而出,转向现代化的新语文建设。无论是从研究的对象看还是以研究的观点方法言,维新时期的语文改革理论及其实践,均已不应隶属于中国传统语言学的范畴,而成为事实上的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端。为此,特将它列为本书的第一章,以明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渊源。另外,为了阐述某一问题的历史过程,有时也连带介绍一些发生于维新时期之前、或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如:“汉字简化”一章的导言,简要阐述了自秦朝“书同文字”以来的汉字简化情形,是为阐明现代汉字简化的历史缘由。“拉丁化新文字”一章,为说明它存在的全期历程,其有关学术研究和推行活动,则写到1955年11月最后一个新文字团体宣告解散为止。本书正文总体框架所确定的时限,如果以卢懋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为语文现代化运动兴起的标识,即自1892年始至1949年止,历时半个世纪有余。因此,它是一册关于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历史性著述,当代中国的语言计划

则不在本书的论述范围。

我国现代的语言计划，是为建立新语文而从事的系列化的语言文字工程。凡很不适应或不很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汉语文工具及其应用现实，均在其时施行变革的任务之列，并且在贯彻执行中取得不同程度的成效。如：倡导以白话文替代文言文的应用，结果在实践上取得了白话文在文学创作、语文教育、新闻出版以及日常文书诸领域的正式应用地位，使汉语书面语初步实现了“言文一致”。“国语”音系标准的确定及国音字汇的审定，不仅使口语的规范有据，而且在推广中为共同语的普及或语言的统一奠定了现实基础。推行汉语拼音和简化汉字，前者弥补了汉字表音繁杂无序的不足，后者则促进了汉字体系的简便化，同时也为深化汉字改革提供了多种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总之，这个工程的诸系列项目内容，已经全面地涉及到口语与书面语、方言与共同语、语言与文字诸矛盾方面的种种语文问题。

这个工程的各种项目，是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或几个阶段的延续工作，方才逐步完成或部分完成的。如，书面语的革新，先后经历了“新文体”、“白话文”和“大众语”三个内涵有别而又前后衔接的阶段实现的。清末的“新文体”，还只是夹用了俚语浅说的“通俗文言文”，“五四”时期的“白话文”，亦未完全摆脱“半文半白”的体式，于是到了30年代又提出“大众语”，以强调书面语的口语化。正是在这渐进的过程中，逐步深化了由文言到白话的书面用语的变革。再如，确定“国语”的语音标准，也先后经历了“老国音”和“新国音”两个阶段。这是在作为混合音系的老国音，经过实践的检验并不合实用后，方

改弦易辙而采定以单一音系（北平音）为据的新国音。此外，在研究、推行汉语拼音、简体汉字、标点符号等项目时，也存在过先后有别或多式方案并存的情况，它们的目标虽然是一致的，但方案的具体内容则往往因人、因时而异，均非一蹴而就的。其原因，不外学术准备不充分、实践经验积累不足或受社会条件的制约。这样，该工程各项的实际效果，在进行中就会出现反复，更难以在短期内告成。

这个工程，还是由我国现代新文化的倡导者，以及大批有识之士和广大支持者共同建造的。他们为创建我国现代新语文事业，分别进行了各种专门研究和推行试验。如：辛亥革命前20年的时间里，由个人研制的“切音字”竟达20余种之多，并大都由个人或团体在民间推行，因而造成一代新潮，被称为“切音字运动”。此后的“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三个公定的方案，也是在个人研制的基础上，经过大家反复切磋、修订并经集体审议的产物。“拉丁化新文字”还得到过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并一度成为他们学习文化的工具。作为最早刊布的第一份公定简体字表《手头字第一期字汇》，乃是由当时文化界200位知名人士共同签署、倡议推行的。至于成绩最为显著的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那是由《新青年》杂志社和“国语研究会”的同仁开首的，并由于广大作家、教员、学者、记者、演员及其他支持者的身体力行，才逐渐掀起讲国语、写白话的潮流。因此，这个系列工程的种种业绩，大都是在群众运动中造成的。

基于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上述特点，本书的写作体例，没有采用历史的顺序进行分期综合叙述，而以全期所从事的汉语

文改革和建设事业的种种项目分别归类列章（第一章例外）。这样做，既是为使我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系列项目能平面地展示出来，分门别类地介绍它们的社会背景和群众基础；也是为了便于分别阐述各新语文事业的历史脉络及其发展全过程；并且避免了下位再分期的犯难。

本书所预设的写作原则是：所论及的语文问题，须以史料为依托，不作浮泛的议论和推度；一切从语文问题的实际出发，而不受主观意识或派别偏见的牵掣；在评估它们的社会功用时，重在历史价值的钩沉，避免超越时代的苛求。

本书是对我国现代史上（含清末时期）有关语言计划的理论主张、学术争鸣、团体机构、提案决议、推行实际以及研究成果诸方面，所进行的一次综合性研究的尝试。它所概述的内容未必周全，所论述的问题也难免失当，然本书还是试图围绕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主要项目，并注意学术性的剖析而展开写作的。书中，对多种具有代表性著述予以专门介绍，并另加了三个具有比较性的“附录”，同样是希冀进一步昌明我国现代语言计划的学术价值。

一、晚清时期的语文改革 及其历史地位

晚清时期的语文改革，是指从变法维新到辛亥革命期间所形成的一代关于汉语文改革的新潮。由于社会变革意识的萌发和现代科学文化的启迪，改革不尚实用的语文的企求也就应运而生了。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转折期，也是中国传统语言学向着现代语言学发展的过渡阶段。主张变革当时语文应用现实的滞后状况以适应形势的发展，也是对于守旧、落后的语文观的否定，成为开启我国现代语言学思想的先河。因而晚清时期语文改革的理论主张及其学术业绩，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上，实为中国现代语言计划事业的发端。

晚清时期，关于汉语文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三：

甲、提倡以口语为基础的“新文体”；

乙、推广作为共同语的“官话”；

丙、试行拼音制的“切音字”。

这些语文改革的主张或举措，均是以崇尚实用、改善语言文字的工具性职能为目的的，是顺应社会新形势的需求和语文发展的历史趋势的。尽管作为现代语言学的专门著述，其时还不多见，可是在众多的语文改革读物和其他倡导新学的著述里，有关现代语言学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已经屡见不鲜。同时，在推进语文改革的实践上，也取得一定规模的实际成效。因此，我国的现代语文改革运动，虽说勃兴于“五四”时期，而晚清时期的语文改革思潮和实践，却为之作了思想理论和实际经验的准备。

1. 提倡以口语为基础的“新文体”

所谓“新文体”，也就是广义的“白话文”，是相对于旧文体的“文言文”而言的。当时，作为汉语书面用语的文言文，在“文”与“言”的关系上已经远离，不便应用。因而主张以“言文合一”的新文体替代处于正统地位的文言文，以利人们的应用。

“言文合一”的主张，当初主要是从解除束缚思想的“文言”的限制或应用俚语浅说的美学价值立言的，是为了适应新思想、新学术或新生活的表述需要。这虽说还是一种文学主张，

但它同样从理论上阐述了语言随着社会而发展的规律性，说明只有建立在活着的口语的基础之上的书面语方才具有普遍的实用价值。提倡“诗界革命”的黄遵宪早在1868年（同治七年）就写有这样的诗句：

“我手写我口， 古岂能拘牵？
即今流俗语， 我若登简编，
五千年后人， 惊为古斓斑！”^①

后来，他写《日本国志·学术志》，对口语（语言）与书面语（文字）的关系以及它们的特点又作了明确的阐述。所谓：

“文字者，语言之所从出也。虽然，语言有随地而异者焉，有随时而异者焉；而文字不能因时而增益，画地而施行。言有万变而文止一种，则语言与文字离矣。居今之日，读古人书，徒以父兄师长，递相授受，童而习焉，不知其艰。苟迹其异同之故，其与异国之人进象胥舌人而后通其言辞者，相去能几何哉？”

“余闻罗马古时，仅用腊丁语，各国以语言殊异，病其难用。自法国易以法音，英国易以英音，而英、法诸国文学始盛。耶稣教之盛，亦在举《旧约》《新约》就各国文辞普译其书，故行之弥广。盖语言与文字离，

^① 见《黄遵宪诗选·杂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①

梁启超在肯定“俗语文学”的同时，亦认定“古语文体”决非文学的进化，主张采用言文一致的“俗语文体”。他认为，文学的语言与现实的语言相去愈远，则愈不能进步。“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宋后俗语文学有两大派，其一则儒家、禅家之语录，其二则小说也。小说者，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而且，“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指俗语文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百文章，莫不有然。”^②

由文学的语言形式而直接论及一般书面用语的革新问题者，则首推裘廷梁，所撰《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第一次明确提出“崇白话废文言”的主张。他说：

“文言也，白话也，繁简不同，而为用同。只有迟速，更无精粗。必欲重此而轻彼，吾又乌知其何说也？且夫文言之美，非真美也。汉以前书曰群经，曰诸子，曰传记，其为言也，必先有所以为言者存。今虽以白话代之，质干具存，不损其美。”^③

他在比较文言与白话的异同后，把“白话”的好处归纳为“八益”，即：“省日力”、“除骄气”、“免枉读”、“保圣教”、“便幼

① 见《日本国志》（卷三十三），光绪富文斋初刊本。

② 见《小说丛话》，引自《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四）。

③ 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引自《清议报全编》（卷二十六）。

学”、“炼心力”、“少弃才”和“便贫民”。除开从作品思想内容方面立论的诸点外，这当中所谓节省时间的“省日力”、避免误解的“免枉读”、开启思维能力的“炼心力”和方便大众的“便贫民”诸点，显然都是改革语文工具以利实用的至要之论。

正是由于崇尚实用的语文观念的萌发，在文体革新的实践上以白话报刊和白话文学为标志的“新文体”开始有了蓬勃的发展。

自1898年裘廷梁创办《无锡白话报》以后，各地白话报层见叠出，相继刊行的有《扬子江白话报》、《苏州白话报》、《杭州白话报》、《绍兴白话报》、《宁波白话报》、《中国白话报》、《上海新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江西新白话报》、《潮州白话报》、《北京京话报》、《伊犁白话报》等数十种。诚然，发行白话报并非从裘廷梁始，早在1876年，上海的申报馆就曾出过一种通俗的《民报》，“字句皆为寻常说话”，但那时并未形成风气，只是在变法维新时期，白话报才得到蓬勃的发展。

此外，白话文教科书，用白话创作、翻译的文学作品及其他读物亦通过各种途径编印发行。如：上海彪蒙书室曾出版白话教科书多种。提倡白话文的先行者陈子褒，用白话编撰了三字书、四字书、五字书等启蒙读物，以替换《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的传习。在文学作品方面，像《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等，均是运用白话的成功之作。翻译的作品，当时虽以文言的为多，但也出现了《侠隐记》、《劳苦世界》等流畅的白话译著。同时，一批用白话编撰的工具书，如《绘图白话字典》、《绘图中国白话史》、《绘图中国白话地理》等，以及其他用白话写作的学术论著也陆续刊行。